

理學宗傳

【清】孫奇逢 撰

萬紅 點校

徐公喜 主編

理學淵源考辨叢刊



鳳凰出版社

理學宗傳

【清】孫奇逢 撰

萬紅 點校

徐公喜 主編

理學淵源考辨叢刊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理學宗傳 / (清) 孫奇逢撰 ; 萬紅點校.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5. 10

(理學淵源考辨叢刊)

ISBN 978-7-5506-2240-1

I. ①理… II. ①孫… ②萬… III. ①理學—歷史人物—列傳—中國—古代 IV. ①K825.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227398號

- | | |
|-------|---|
| 書名 | 理學宗傳 |
| 著者 | (清)孫奇逢撰 萬紅點校 |
| 責任編輯 | 汪允普 |
| 出版發行 |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
| 出版社網址 | http://www.fhcbs.com |
| 經銷 |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排 |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
| 印刷 | 江蘇鳳凰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中國江蘇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堯新大道399號,郵編:210038 |
| 開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張 | 17.75 |
| 字數 | 461千字 |
| 版次 |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5506-2240-1 |
| 定價 | 78.00圓 |
-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25-68037410)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上饒師範學院朱子學研究所招標課題
江西省2011朱子文化協同創新中心項目

總 序

理學流派衆多，異彩紛呈。歷代學者對前代理學學術作“分其宗旨，別其源流”的工作，始於宋代而盛於明清。從宋到清，理學學術史著述貫通，繼南宋《伊洛淵源錄》、《伊洛正源書》之後，元代有《宋史·道學傳》、《道統圖》；明代有《伊洛淵源續錄》、《閩學源流》諸書；明末至清代，有《元儒考略》、《聖學宗傳》、《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儒林宗派》、《理學宗傳》、《清學案小識》、《北學編》、《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民國初期編纂有《清儒學案》。《宋元學案》、《明儒學案》與《清儒學案》又合稱《四朝學案》。許多著述源於理學士人強烈的社會危機感、學術危機感和歷史反思意識。從學術層面對社會治亂進行深層次的思考和總結，他們得出的一種帶普遍性的結論是天下興亡在人心，人心良莠在學術；要拯救天下、拯救人心，必須明辨學術。李顥就說過：“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全祖望：《鮚埼亭集》卷十二《二曲先生窆石文》，《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理學學案著述大致分爲四個階段，明末清初成爲高峰。

第一階段，南宋時期，是理學史著述起源時期。《伊洛淵源錄》是南宋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所輯理學家傳記匯編，專門敘述理學的源流，成書於乾道九年（1173）。朱熹《伊洛淵源錄》“記周子以下及程子交遊門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門而言行無所表見，甚若邢恕之反相擠害者，亦具錄其名氏以備考。……蓋宋人談道學宗派，自此書始，而宋人分道學門戶，亦自此書始”（《四庫全書總目》）。朱熹把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及其弟子的行狀、墓誌銘、遺事等傳記資

料，排成理學譜系，並以二程為中心，溯源探流。自《伊洛淵源錄》後，《宋史》特立《道學傳》，由此開理學史著作之先聲。李心傳《道命錄》採用文獻編纂與注文論述相結合的體例，以程頤、朱熹為主綫，記載宋代 140 年間道學三起三落的興廢歷程。《道命錄序》說：“故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萃為一書，謂之《道命錄》。蓋以為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者，天實為之，而非（章）惇、京、（秦）檜、（韓）侂（冑）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他又說：“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

第二階段，元至明中期，是理學史著述發展時期。這一時期主要有元代《宋史·道學傳》，吳澄《道統圖》；明代有殷奎《道學統緒圖》，謝鐸《伊洛淵源續錄》，宋端儀撰、薛應旂重修《考亭淵源錄》，林稹《續朱子伊洛淵源錄》，朱衡《道南源委錄》，薛甲《心學淵源錄》，陳階《道教淵源錄》，鄔良佐《道學統宗內外二傳》，江尚和《紫陽道脈錄》，金賁亨《道南錄》《台學源流》，劉元卿《諸儒學案》《儒宗考輯略》，王之土《道學考源錄》，楊範《道統言行集》，陳雲渠《浙學譜》，劉長卿《浙學心傳》，王圻《道統考》，馮從吾《元儒考略》和《關學編》，周汝登《聖學宗傳》，徐奮鵬《古今道脈》，魏顯國《儒林全傳》，楊應詔《閩學源流》，劉鱗長《浙學宗傳》，辛全《理學名臣錄》，趙仲全《道學正宗》，劉宗周《聖學宗要》《明道統錄》，程瞳《新安學系錄》等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元儒考略》提要說：“明儒喜爭同異，於宗派尤詳，語錄、學案，動輒災梨，不啻汗牛充棟。”

第三階段，明末清初時期，是“理學學案”著述鼎盛期。主要有孫奇逢《理學宗傳》，黃宗羲《明儒學案》和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熊賜履《學統》，萬斯同《儒林宗派》，張伯行《伊洛淵源續錄》《道統錄》，此外還有魏裔介《聖學知統錄》、《聖學知統翼錄》，魏一鰲《北學篇》，湯斌《洛學篇》，范鎬鼎《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國朝理學備考》，張夏《洛閩淵源錄》，竇克勤《理學正宗》，錢肅潤

《道南正學編》，朱塞《尊道集》，汪佑《明儒通考》，王維戊《關學續編本傳》，王心敬《關學編》，朱顯祖《希賢錄》，耿介《中州道學編》，王植《道學淵源錄》，張恒《明儒林錄》等。

第四階段，清朝中後期至民國是理學學術史著述延續時期。清中後期有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唐鑑《清學案小識》，劉廷詔《理學宗傳辨正》，羅澤南《姚江學辨》，黃嗣東《道學淵源錄》，成孺《國朝學案備忘錄》，何桂珍《續理學正宗》，王檢心《聖學淵源錄》；另民國有徐世昌《清儒學案》、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等等。

從宋到清，理學史著述除了貫通這一特點外，還形成了以下特點：

1. 體例豐富，各具特色。宋代朱熹作《伊洛淵源錄》，明代劉元卿作《諸儒學案》、馮從吾作《元儒考略》、周汝登作《聖學宗傳》，明末清初孫奇逢作《理學宗傳》，反映學派源流，撰寫學者人物傳記，不反映各家各派的學術宗旨，仍然屬於紀傳體史書的範疇。從體裁上看，既有年譜傳記（如《濂溪志》等），也有學案（《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類傳（《理學宗傳》等）、雜考（《元祐黨籍碑考》等）。

2. 內容龐雜，著述繁多。主要有：概括型理學著述，其中正史中的《道學傳》、《儒學傳》等反映各朝各代儒學研究和發展的概況；部分型理學著述，如《諸儒學案》、《聖學宗傳》、《儒林宗派》、《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綜錄型理學著述（分通錄與斷代），如《伊洛淵源錄》、《道南源委》、《元儒考略》、《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理學宗傳》、《清學案小識》、《北學編》、《國朝宋學淵源記》，以及《清儒學案》、《諸儒學案》等；地域型理學著述，如《閩中理學淵源考》、《江西理學考》、《關學編》、《洛學編》，以及《台學統》、《北學錄》、《皖學編》等等；專項型理學著述，如《實學考》、《顏氏學記》等，更是多不勝舉。

3. 學術多元，相互交融。朱陸合流與分異成為主綫，宋以後學術發展多元化與一元化交融。其中《明儒學案》以王守仁心學發

展演變為主綫，全面系統地反映出明代學術發展的全貌。

4. 續修成形，前後相映。如朱熹《伊洛淵源錄》與明代謝鐸《伊洛淵源續錄》、林積《續朱子伊洛淵源錄》、張伯行《伊洛淵源續錄》；明代馮從吾《關學編》與清代王心敬《關學續編》；清朝湯斌《洛學編》和尹會一《洛學編續編》；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與清王梓材、馮雲濠編《宋元學案補遺》；孫奇逢《理學宗傳》與劉廷詔《理學宗傳辨正》等等。

儒家把自己看成是中國文化的傳承人。韓愈在《原道》卷十一中，首次明確地提出了一個具體的傳授譜系：“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自從朱熹的《伊洛淵源錄》以後，後世以儒學道統為主綫撰述學術史的著作紛紛而出，陶望齡《聖學宗傳》序言稱：“統不一則大寶混於餘分，宗不明則聖真奸於曲學。”從《諸儒鳴道集》、李心傳《道命錄》到元代《宋史·道學傳》、吳澄《道統圖》，從明代黎溫《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楊廉《皇明理學名臣言行錄》到清初劉元卿《諸儒學案》、周海門《聖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熊賜履《學統》、張伯行《道統傳》、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以及《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皆有此意。

世人普遍認為“明以來，談道統者揚己凌人，互相排軋，卒釀門戶之禍，流毒無窮。斯同目擊其弊，因著此書”（《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儒林宗派》），闡明了萬斯同編寫《儒林宗派》的宗旨。孫奇逢編著《理學宗傳》時也認為辨聖學、分正統是影響世道盛衰的要事，指出：“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學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他編有自己的道統承傳譜系，指出：“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

子，孰爲今日之貞乎？”張夏則認爲：“世之儒者往往陽儒陰釋，以進釋退儒，始而薄程、朱，繼而卑孔、孟。由是道術凌雜，世教日衰。”“宋儒之道多沮抑於小人，害尚淺，故其名先晦後顯。明儒之道先掩蝕於新學，害尤深，故其實雖存若亡。”他認爲：“學者居今日而尚論前人，或聞其名未睹其實，或習其言未考其行，苟無記錄，何以詳驗本末始終，而知其爲足以砥衰還盛也乎！況邪慝流殃，設吾黨不早論定，得無有紊亂先型以迷惑後生者乎？”（張夏：《雒閩源流錄原序》，引自范鎬鼎《理學備考》，清康熙十七年刻本，五經堂藏版）從中反映了宋明道統所遇到的困境。因而恢復與振興道統，可以說成爲宋以來，理學家們一直爲之努力的目標。清王新命《學統序》也指出“然人心之不正，由於道統之不明；道統之不明，由於學術之不端”，指明熊賜履著《學統》就是爲“繼正脈而扶大道，闡千聖之真諦，正萬古之人心，直與日星河嶽同垂不朽”。

就理學史著述而言，朱熹《伊洛淵源錄》、萬斯同《儒林宗派》、周海門《聖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張伯行《道統傳》、黃宗羲《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以及熊賜履《學統》等的成就最爲突出。

《伊洛淵源錄》開創了理學學案史的先例，明、清以來不少學術史著作者沿襲這一體裁。這是朱熹對中國古代歷史編纂學的一大貢獻。

由於《明儒學案》本身傳播的影響所及，如今的明代儒學研究，多以黃宗羲《明儒學案》中的選錄作爲治明代儒學思想史的經典和文獻依據，論者又每每取黃宗羲案語，而不及周海門、孫奇逢等，忽略了《聖學宗傳》、《理學宗傳》等的研究價值與歷史地位。然《聖學宗傳》、《理學宗傳》均早於《明儒學案》，周海門的《聖學宗傳》成書於萬曆三十三年乙巳（1605），孫奇逢的《理學宗傳》比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成書早十年。對於《明儒學案》的學術價值，錢穆先生提出了中肯意見：“余少年讀黃梨洲《明儒學案》，愛其網羅詳備，條理明晰，認

爲有明一代之學術史，無過此矣。中年以後，頗亦涉獵各家原集，乃時憾黃氏取捨之未當，並於每一家之學術淵源，及其獨特精神所在，指點未臻確切，乃復時參以門戶之見、意氣之爭。”“故其（梨洲）晚年所爲《學案》，亦僅可爲治明代儒學者一必要之參考書而止。”（見《讀劉蕺山集》，《錢賓四先生全集》（21），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351，頁365）指明《明儒學案》不足以作爲研究明代儒學最終的文獻依據。

周海門《聖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是我國較早的有特色的系統的學術思想史專著，爲學術史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應當認識到《明儒學案》是深受《聖學宗傳》、《理學宗傳》影響的，《明儒學案》之體例是間取《聖學宗傳》、《理學宗傳》之形式，就此，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有過評論：“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爲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雜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義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疏略。”說明了孫鍾元的《理學宗傳》包含簡述這個學派的源流及宗旨內容，至於“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是否“不以門戶之見”也只是黃宗羲之見而已。

《理學宗傳》將漢代至明末的著名學者分爲三類，“有主有輔，有內有外”，“可謂別出手眼”。第一類，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陸九淵、薛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等十一子是理學蔓衍的宗統、主綫；第二類，其他各代名儒是理學發展的羽翼、輔綫；第三類，歸於與理學道統相背離的異端。對以上三類學者按人立傳，摘其語錄、著作，然後加以評論，從中探尋理學發展的脈絡、階段和變化規律。

《學統》五十六卷，清朝理學家熊賜履所撰的一部學術史著作。時人謂熊賜履“以王佐之才，爲聖天子輔，啓心沃心，興起鴻業，天下莫不想望其風采”。徐世昌《清儒學案》謂熊賜履曰：“康熙一朝宰輔中，以理學名者，前有柏鄉，後有安溪。孝感則由詞臣致位樞衡，侍講筵獨久，本朱子正心誠意之說，竭誠啓沃，默契宸衷。聖祖

之崇宋學，自孝感發之也。”（《清儒學案》卷三十八《孝感學案》）熊賜履推崇理學，提出“非六經、《語》、《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康熙政要·論君道》）。《學統》一書就是“斷自洙泗，暨於有明，爲之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位置論列，寧嚴毋濫”（自序）。以正統儒學的觀點系統闡述評判了從先秦至明代各派學術及其代表人物，大體勾勒出了儒家主流：以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九人爲正統；以閔子以下至明羅欽順二十三人爲翼統；以冉伯牛以下至明高攀龍等一百七十八人爲附統；以荀卿以下至王守仁等七人爲雜統；以老、莊、楊、墨、告子及二氏之流爲異統（《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

閩學淵源流長，自有唐歐陽四門倡起，其後海濱四先生相繼，至龜山先生獲“道南”之譽彰明聖學，閩學開始得以正統而居，至朱子而極盛，其後餘波相沿。《閩中理學淵源考》原名《閩中師友淵源考》，九十二卷，清朝李清馥撰。仿前修體例，序學脈布流，上自龜山，下迄明末，博採群書，井然有條。書成，以特例入四庫，足見其爲學界所重，對此，《四庫全書總目》語之甚詳。

清人張伯行在閱讀仇熙所著《道統傳》時，發現仇熙忽略了與儒家道統傳承進程相關的諸多人物，因更爲增輯，上卷載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及顏、曾、思、孟。下卷載周、程、張、朱。其《附錄》中則載皋陶、稷、契、益、伊尹、萊朱、傅說、太公、召公、散宜生及楊時、羅從彥、李侗、謝良佐、尹焞。人各一傳，述其言行，而以《總論》冠於卷端。其目的在於一方面使學者更好地理清道統的淵源所在，另一方面可以適應當時朝廷崇儒重道、文教聿興的環境。

學術界對於探討理學淵源的古籍整理呈現出一種零碎化、簡單化的現狀，相關內容多數只是散落或部分出現於各類理學古籍中，這對於欲深刻瞭解並掌握理學淵源的研究者而言是不便利的，研究思想方法也難以進一步拓展。《理學淵源考辨叢刊》是將周海門《聖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張伯行《道統錄》、李清馥《閩中

理學淵源考》以及熊賜履《學統》輯而為一。這一課題的設立，一方面可以廓清理學發展的脈絡，多角度地探究理學淵源；另一方面可以為學者提供除《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經典著作以外的豐富資料，拓寬學者的研究視野，有助於開拓理學、中國哲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領域。

徐公喜

二〇一〇年六月於南山齋

點校說明

《理學宗傳》二十六卷，清初理學家孫奇逢撰。奇逢字啓泰，號鍾元，晚年又以“歲寒老人”自命，河北容城人。生於明神宗萬曆十二年(1584)，卒於清聖祖康熙十四年(1675)，年九十有二。萬曆二十八年舉人，自明及清，前後十一徵而不出，布衣終身而負重望，世人贊之謂“孫徵君”。因晚年講學於河南輝縣夏峰村，故又有“夏峰先生”之稱。與黃宗羲、李顥並號“清初三大儒”，然《清儒學案》又云，孫氏與黃、李相比，“氣魄獨大，北方學者奉爲泰山北斗”。生平事蹟見於《清史稿》卷四八六本傳、《明儒學案》卷五七《夏峰學案》及江藩所撰之《國朝宋學淵源記》。

孫奇逢爲人正直，極富正義感和民族氣節，他“義之當爲，不少退避”，一生與明清更迭的歷史過程相始終。早年志存經世，中年奔走國事，晚年著述課徒。期間，鬥閹黨、抗清軍、拒清廷，可謂歷盡坎坷，備嘗艱辛。但他大義凜然，雖一介書生卻氣銳骨堅，肝腸如雪，直令黃宗羲等大爲推崇，稱“燕趙悲歌慷慨之風久湮，人謂自先生而再見”。

作爲頗具盛名的理學家，孫奇逢學術醇正，學風篤實，堅持治學與治世相結合，堅持學以致用。認爲“學術之廢興，系世運之升降”，“儒學爲治天下”，士人不應是“腐儒曲士”，而要做“經世宰物”的實幹家。一生筆耕不輟，潛心經史，著作等身。《理學宗傳》正是其“八十年，躬行心得，悉見於此”的鴻篇大作。是書以排斥釋老之學、合通儒學派別之異爲要旨，各卷首著錄儒學小傳，次爲著述摘編，末爲後人及作者評語，且對各家傳記附以眉批，以“主輔”“內外”爲主架，構築了一個能容納由漢到明諸學術大師的殿堂，並通過大宗、小宗、內家、外雜的次序排列，展現了古代學術思想史發展

的基本綫索和宋明理學宗傳的演變過程。

作者雖折衷朱陸，但傾向程朱，“專主躬行，不在詞章訓詁爲學”，對於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綫索給予概述，具有開創意義。

此次點校，以《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年張沐程啓朱刻本影印，簡稱續修本）爲底本，以光緒六年（1880）浙江書局刊本爲對校本（簡稱光緒本），以《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和《周敦頤集》、《二程集》、《皇極經世全書》、《朱子全書》、《王陽明全集》、《讀書錄》等諸儒文集及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作參校。書中眉批皆移入正文，用黑體標出，底本中後人及作者評語的雙行小字，改作小五號宋體。

此書校點自選題至付梓，歷經數年。因參與者的人事變更，最後由龍飛標點了卷一至卷十三的初稿，萬紅完成了卷十四至卷二十六的點校，以及對全書的統稿和校點說明的撰寫。限於點校者的水準，錯誤及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敬祈讀者指正。

萬 紅

理學宗傳序

天之所以賦人者無二理，聖人之所以承天者無二學。蓋天命流行，化育萬物，秀而靈者爲人，本性之中五常備具，其見於外也，見親則知孝，見長則知弟，見可矜之事則惻隱，見可耻之事則羞惡。不學不慮之良人固無異於聖人也。惟聖人爲能體察天理之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強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而精微遂至窮神知化之際。蓋其知明處當，乃吾性中自有之才能；參天贊化，亦吾性中自有之功用；止如其本性之分量，而非有加於毫末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爲教之目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聖學之淵源、王道之根柢也。由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顏、曾、思、孟，成己成物，止有此道，在上在下，止有此學。秦、漢而後，道喪文敝，賴江都、文中、昌黎衍其端緒，至濂溪周子崛起舂陵，直接鄒魯，程、張、邵、朱以至陽明，雖所至或有深淺，氣象不無少異，而中所自得，心心相印，針芥不爽，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苟得其本心之同然，則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固無異親授受於一堂者矣。如高曾祖禰與嫡子嫡孫，精氣貫通，譜牒昭然，而旁流支派，雖貴盛於一時，而不敢與大宗相抗，蓋誠有不可紊者在也。近世學者，或專記誦而遺德性，或重超悟而略躬行，又有爲儒、佛合一之說者，不知佛氏之言心言性，似與吾儒相近，而外人倫、遺事物，其心起於自私自利，而其道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吾儒之道，本格致誠正以爲修，而合家國天下以爲學。自復其性謂之聖學，使天下共復其性謂之王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豈佛氏所可比而同之乎！

容城孫先生集《理學宗傳》一書，自濂溪以下十一子爲正宗，後

列《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端緒稍異者爲補遺，其大意在明天人之歸，嚴儒釋之辨，蓋五經四書之後，吾儒傳心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悉見於此。斌謝病歸田，從學先生之門，受而讀之，其折衷去取、精義微言，幸承面誨而得有聞焉。時內黃令張君仲誠潛修默悟，力任斯道，迎先生至署，蠲俸付梓。先生命斌爲序，斌何言哉！惟曰：天下同志讀是書者，無徒作書觀也，止由此以復天之所與我者耳。吾之身，天實生之，無一體之不備；吾之性，天實命之，無一理之不全。吾性實與萬物爲一體，而民胞物與不能渾合無間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堯、舜同量，而明倫察物不能細大克全焉，吾性未盡也；吾性實與天地合德，而戒慎恐懼不能如乾健不息焉，吾性未盡也。誠由濂、洛、關、閩以上達孔、顏、曾、孟，由孔、顏、曾、孟而証諸堯、舜、湯、文，得其所以同者，返而求之人倫日用之間，實實省察克治，實實體驗擴充，使此心渾然天理而返諸純粹至善之初焉，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中和可以位育，而大本達道在我矣。不然，徒取先儒因時補救之言，較短量長，橫分畛域，妄起戈矛，不幾負先生論定之苦心乎！且亦非仲誠公諸同好之意矣。陸子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斌惟與天下學者共勉之而已矣。

康熙丙午孟冬
睢陽後學湯斌謹序

理學宗傳叙

夫人而不讓堯、舜、孔子者，本體也；夫人而讓堯、舜、孔子者，工夫也。本體具，嘗足牽制人心於天理之域，而不得放肆於爲惡；工夫亡，則感物誘知，勢又足以蔽天理而不免於禽獸之心，此天下古今所以多中材也。本體者理，工夫者學。理者，天之所以與我而無不足也；學者，人之所以自盡而無不能也。苟從事於此，皆可以憑越中材，而爲堯、舜、孔子之聖矣。然不得其傳，流爲異端；不得其宗，亦究于小生曲儒而已。今天下讀堯、舜、孔子之書者，止以供其辭章口耳之用，無足齒數。高者苦力制行，卓然賢善，其於本體卒無所窺，則亦不失爲義。襲而取實，不得謂聖人之道遂如是已焉，何也？道原諸天，體天之理而有道之名，盡天之實而有學之名，非挹取其端緒、倣畫其節目之所能爲也。鍾元孫先生集理學之書，以“宗傳”爲名，宗諸天也。蓋八十年中，下學上達，有不可以告諸人、人亦終不得而知者，悉著諸此。其書以爲自堯而下，以至於孟子，業有五經四子之書爲宗傳於前矣，茲起漢訖明，諸儒無不備載於其中，又特表十一子，以嗣諸孟子之後，而又爲一宗傳焉。大哉《宗傳》乎，非自爲一書，特合五經四書爲一大部書也；又非自爲十一子，特合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爲一大流人也。使學者讀之，不恨五經四書而後無書，堯、舜、孔子而後無人，然後知人不必皆堯、舜、孔子也，而無不可以爲堯、舜、孔子，天也。人人而天，人人而皆可以爲聖人，何也？天無規則，仰而不愧，俯而不忤，即規則也；天無程限，仰而有愧，俯而有忤，即程限也。如是而尚拱手讓堯、舜、孔子焉，豈丈夫乎？故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故堯、舜之事與衆聖人同者，不足見其聖，而于揖讓見之；湯、武之事與衆聖人同者，不足見其聖，而于放伐見之；周公、孔子之事與衆聖人同